

從非觀眾研究探博物館大學生觀眾：以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為個案研究

The Audienc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A Case Study of The Non-Visitors of The National 228 Memorial Museum

鍾如¹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所

摘要

紀念館作為展示、收藏、研究的機構，也肩負歷史教育、紀念受難者及人權教育推廣的功能。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承載著受難者家屬及社會各界的期待而成立，而自 2011 年正式開館營運至今，除了偶而預約參觀的公務團體及受難家屬的關注外，能見度與民眾參與程度仍不如預期，為何有如此現象？尤其擁有地利之便、並具備一定先備知識，於台北市就讀的大學生們，為何不參觀紀念館？非觀眾被視為「潛在的新觀眾」，探究誰是潛在觀眾、如何和他們接觸，了解他們對博物館有何期待與需求，有助於紀念館發展觀眾計畫。

本研究以博物館非觀眾為探究焦點，研究對象為「從未參觀過」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大學生，並以台北市區的兩所大學為研究範圍，主要目的在於了解大學生的博物館經驗、影響他們不參觀紀念館的原因，以及對於紀念館期待與建議。透過焦點團體之前導研究發現，受訪者大多認為展示主題及內容與日常生活、個人經驗無關，而且空間氣氛沉重加上缺乏宣傳與教育推廣活動，使他們缺乏參觀動機。學校教育內容與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當天的媒體作為，也影響大學生對於二二八事件之紀念性與看法，部分受訪者更顯示有逃避自己民族之歷史的現象。而從量化問卷調查之結果發現，參觀意願受到學科背景、過去相關展覽參觀經驗及家庭背景影響。人文社會學科背景的學生較其他學科背景對參觀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參觀意願高，且對二二八事件的認知與紀念性認同度較高，而沒有參觀意願的大學生主要因為不瞭解二二八事件被紀念的意義、對相關議題沒有興趣，甚至認為相關議題已流於政治操弄、造成族群對立。

研究建議除了增加當代議題與生活連結外，與學校通識課程結合也可引發興趣。紀念館除需加強宣傳與教育推廣活動外，也應於二二八和平紀念日，提供各種媒體深入的研究與口述歷史等素材，以增加新聞議題深度並使民眾瞭解其紀念性、加強轉型正義課題之介紹與反思，以多元角度及不同觀點呈現二二八事件。

¹ vhao71082@hotmail.com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二二八和平紀念日，對於許多人來說是一個國定假日，但卻是台灣近代歷史上在長達四十多年的戒嚴時期，被政府刻意打壓、遺忘，卻始終無法忘卻的事件。即使隨著解嚴後民主化的進程，以及各種平反運動的呼籲，甚至近年設立了「國家級」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來紀念之，但二二八事件總在紀念與遺忘之間的縫隙擺盪。對現代的年輕人而言，從課本中不多的描述，「依稀」記得二二八是個「紀念」的日子；但二月二十八日對許多未經歷過事件的年輕人而言，經常只剩下放假的價值，也逐漸喪失了對此歷史事件進一步的瞭解。陳香君（周靈芝、項幼榕譯，2014）認為，臺灣民眾在「創傷後的環境」中，思考如何「重建」臺灣自我認同的機會和潛力，在被統治者要求「向前看」的支配性遺忘邏輯下被壓抑，影響了戰後到至今的臺灣社會、文化和心理狀況的創傷效應仍持續延續。也因為如此，在社會普遍「不想再提」、「不想再記得」的強烈態度下，二二八事件似乎逐漸在臺灣新一代人的「集體記憶」中消失。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作為二二八事件的展示、收藏、研究機構，也肩負文化與歷史教育的功能。它成立時間晚於台北二二八紀念館以及各地私人紀念館，象徵一個「國家級二二八事件紀念館」，承載著受難者家屬與社會各界的期待而成立，在展覽的內容與導覽中，也不斷強調傳承的重要性，以求「永不忘記」及「不再發生」。然而，其成立至今，除了受難家屬的關注及零星的公務員或公教團體的預約參觀導覽外，能見度與一般社會大眾及青年學生的參與程度仍不如預期。

本研究試圖以就讀台北市內兩所大學「從未參觀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主要目的在於了解大學生觀眾為何不參觀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透過對大學生非觀眾認識二二八事件的來源、對二二八事件紀念性的認知，期望理解非觀眾的需求與期望，提供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未來規劃相關教育、活動與展覽之參考依據。

二、文獻回顧

（一）二二八紀念館與觀眾研究

紀念館研究中，以二二八相關紀念館作為研究場域的文章，目前成果不多，且研究個案與場域多集中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的展示或經營研究；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為 2011 年才正式營運，目前尚未見得以其為個案及場域進行研究的論文。

就台北二二八紀念館中的觀眾研究中，陳佳利（Chen, 2003）從成人學習的觀點，以質性訪談研究法，探討五位成人觀眾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的學習經驗。研究指出成人於該館的學習模式分別有取得資訊、重新以個人經驗建構歷史架構、與先備知識比較、建立其歷史觀。她認為不同背景的觀眾會有不同的詮釋，當博物館傳遞的資訊與其先備知識是矛盾的，觀眾可能會強烈質疑既有的知識，重構其知識架構，又或是強烈質疑博物館所提供的資訊，拒博物館的詮釋於門外，以自己的角度參觀。之後，陳佳利（2007）更進一步以歷年來一千多份觀眾留言條為素材作為觀眾研究之方式，討論觀眾在博物館中的多元經驗與反應其研究分析整理發現觀眾的留言內容大約可分為：對受難者家屬或受難者之感言、學習及教育的反思、對歷史創傷的詮釋與反應、政治性與情緒性之感言以及其他反應。並發現不同年代的參觀觀眾對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會產生不同的反應，反映出台北二二八紀念館這樣特殊的議題與場域中，觀眾的參觀經驗除了受到個人的經驗、先備知識與參觀環境的影響，也會與當下政局與社會議題產生連結。

（二）誰是博物館的非觀眾？

究竟誰是博物館的非觀眾？——根據 Hooper-Greenhill（1999）引自 Desai 及 Thomas 的研究，將博物館非觀眾定義為「最近十二個月內從未參觀過博物館或美術館的民眾」。呂憶皖（1998）則將非觀眾定義則是「從未參觀過」或「曾經參觀過，但在某一特定時段內沒參觀過該博物館」的民眾。除了以參觀頻率與時間點界定非觀眾外，Sandell（1999）依據其研究結果，發現依照博物館非使用（non-user）者對博物館的認知可分為以下三者，一為印象不佳者（The unimpressed），參觀博物館無法讓他們擁有愉悅經驗；二為不確定者（The unsure），過去曾經喜歡去博物館或可能對博物館產生興趣，但是因為某些因素，現在不能參觀博物館的人，則歸屬於不確定的範疇，他們也沒有掌握足夠的資訊作為決定參觀博物館與否的依據；三為不知者（The unaware），不知道該博物館存在的人，然而此類族群對博物館未必有負面印象，只是缺乏相關資訊，若取得資訊，他們便可做出選擇參觀與否的決定。

劉婉珍（2008）省思觀眾研究與博物館營運發展的關係，提及非觀眾或潛在觀眾逐漸受到博物館關注，非觀眾研究被視為博物館新觀眾研究。林仲如（2010）指出，長期以來在台灣，參觀博物館與政治和教育有著強烈的關聯性，因此許多博物館的產生，並非由常民文化中發展出來的；當博物館的發展「重點」為其館藏、展覽或由此所產生的知識性活動，而社會大眾的需求卻是輕鬆、社交與消費時，博物館面臨的是如何保有原本特色、但同時又可擴展參觀博物館的興趣與範疇，且與社會大眾的日常需求相關等挑戰。然而，缺乏興趣和沒有

時間，已成為非觀眾沒有參訪博物館的最主要的二個原因。

(三) 影響民眾不參觀博物館動機與因素

呂憶皖(1998)統整歸納出三項民眾不參觀博物館的原因，一是心理的阻因，主要源自於民眾對於博物館本質的概念與觀感，以及對自身解讀能力的質疑；二是有形的阻因，博物館外在環境與各項設施使得博物館缺乏「易達性」，讓民眾在博物館中感到不自在。三是知識的阻因，涉及民眾對於博物館展示內容與整體環境看法，使民眾無法對博物館有所共鳴或認同。許功明(2002)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之社區居民為研究對象的研究中，發現非觀眾從不參觀科博館的理由，不是因為他們對科博館內展示或環境的印象不佳，因為他們並沒有實際的科博館參觀經驗，不參觀應該是基於過去不多或模糊的博物館經驗、或對博物館的一般印象產生而來。陳佳利(2003)根據英國「文化、媒體及運動部」(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於2005年5月出版的報告書，更詳細地指出，博物館在機構的、個人的或社會的、相關感官或認知經驗的，以及環境方面等四個妨礙社會參與平等的議題。Getty藝術教育中心與博物館於1991年曾針對美國十一家美術館進行的研究，發現非觀眾認為美術館令人生畏，他們缺乏對博物館的瞭解、也沒有閒暇時間或興趣去參觀，交通因素或博物館的地點也是他們考量的因素(Hein,1998)。而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位於台北市中正區，由於研究對象為就讀於台北市區的大學生，到達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相當容易，因此去掉交通上的環境阻因，以利分析是哪些其他因素造成大學生不參觀的因素。

歷史博物館的非觀眾研究中，Schäfer(1996)在德國波昂(Bonn)的歷史博物館(The Haus der Geschichte)進行一系列的非觀眾評量與研究。分析教育與收入仍是影響決定是否熟悉博物館的主因，但對十四歲以下的兒童不適用，且在經常參觀博物館的家庭的小孩，對該館的認識，與非經常性參觀博物館的家庭的小孩一樣多，顯示學校教育可能是影響因素之一。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已超過十四歲且均為大學生、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免門票，排除了學歷以及收入因素的影響，但學校教育是否是影響參觀博物館的因素，還有待調查與分析。

二二八事件得以公開談論迄今，相關論述的形成皆與族群議題糾葛不清，此議題的討論與追究往往被視為是挑起族群的對立，每到二二八和平紀念日，族群間緊張關係加劇。陳翠蓮(2008)透過各種史料與媒體報導的耙梳，檢視從1947年到2000年二二八事件相關論述的形成過程，以及這些論述中的族群議題。從事件發生之初，國民黨政府的官方出版品不斷描述、誇大二二八事件中的族群衝突，意圖將事件定調為族群問題。戒嚴時期被壓抑、禁止談論的二二八事件，在八零年代浮現時，再度與族群論述綁在一起，但卻是從「族群衝突論」轉變成了「妨害族群和諧論」；此論述將「追究國民黨政府之責任」等同於「指控外省族群」，再等同於「破壞社會和諧」。在追究二二八事件等於挑起族群衝突此種論調下，國民黨政府的責任問題隱而不顯，外省族群反而與國民黨綁在一起，原本是國民黨政府該負責的二二八事件，逐漸轉嫁成全體外省人的罪愆，形成「外省人原罪論」。即使在民主時代來臨之後，國民黨對於早期對二二八事件所下的族群衝突定位，也由於國民黨欲急於破除省籍情結與外來政權的批評，改為宣稱「族群互助」，更加強了「談論二二八事件即是分裂族群」的論述。從此觀點思考，族群問題可能也是影響參觀二二八事件相關紀念館的其中一個因素。

(四) 大學生觀眾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聚焦在台灣的大學生觀眾，然而目前以大學生觀眾為研究對象的論著並不多，仍是待開發之研究領域。楊孟倫（2013）以成大博物館為研究個案，以問卷調查法了解成大學生參觀成大博物館的經驗、參觀動機與認同，並了解不同學科背景學生是否有不同的喜好與參觀經驗。從此案例得知大學生重視展覽與生活或學習知識背景的連結，並希望博物館能夠作為與同儕共同參與活動的地方。而如果博物館要吸引大學生，除了與其生活經驗與興趣連結外，也可以和學校的課程連結，作為課外學習的延伸。

(五) 歷史意識、二二八事件紀念性與博物館人權教育

歷史意識，是由英文「historical consciousness」和德文「Geschichtsbewusstsein」翻譯而來的。歷史意識內容之廣泛，舉凡以時間的角度瞭解現行的政治、經濟制度或宗教、風俗習慣，甚至是各種器物生活層面等等都是歷史意識；歷史意識人人都有，只會因個人接觸的範圍不同、關心的事情不同而有不同的歷史意識，或是所關心的事情複雜性不同而有內容深淺不一的歷史意識。歷史意識並不等於歷史知識，不等於某人能熟記歷史人物的生卒與事蹟、歷史事件的經過與起源等等；儘管如此，歷史知識卻是歷史意識產生的條件之一，對過去一無所知，也不可能會有歷史意識（胡其昌，1983；黃俊傑，1996；周樑楷，2006）。一個人如何觀看過去，必然會影響他如何看待現在和不久的未來；所以，歷史意識與現實意識之間一直是辯證互動的。如果，人們善用這種思維的方法，緊扣現實意識，應該可以理解任何事物都在變動，也了解如何在快速或緩慢變遷的世界中處變的道理，以及如何活絡個人的思想與去除僵化的思考，破解由威權所掌控的「知識」和「真理」（周樑楷，2006）。

歷史紀念館在展示歷史事件時，不免帶著自身（館方或策展者）的歷史意識來詮釋歷史；紀念館可試圖瞭解其目標觀眾的歷史知識，以及對事件的認知程度，亦即歷史知識的程度，進而連結當代議題來規劃展示以及教育活動的內容並引發思考，以期透過歷史知識的傳遞，進而培養觀眾的歷史意識。

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是一個社會在民主轉型之後，對過去威權獨裁體制的政治壓迫、以及因壓迫而導致的社會（政治的、族群的、或種族的）分裂，由政府檢討過去因政治思想衝突或戰爭罪行所引發之各種違反國際法或人權保障之行為，追究加害者之犯罪行為，通常具有司法、歷史、行政、憲法、賠償等面向。轉型正義涉及一個社會從威權過渡到民主的過程，目的為鞏固和保障基本人權之普世價值，以督促政府停止、調查、懲處、矯正、和預防未來政府對人權的侵犯（施正鋒，2007、石忠山，2014）。二二八事件的重新審視是在臺灣民主體制轉型前後，若林正文（薛化元審訂，2014）認為其進展的速度與深度，是藉由選舉政治擴大而得到賦權的本省人，與作為有力少數，在軍界、媒體界與政治界等依然保有影響力的外省人之間，在每一個環節中所達成的妥協。威權體制的執政黨在民主轉型之後繼續執政，而加害者（國民黨）自然不可能自動檢視它過去對人權的侵害，也不可能在道德上否定自己的過去。也因此官方有關「永不忘記」及「不再發生」的措施與行動，是給予受害者的「補償」（恢復名譽、賠償金、紀念碑、紀念日、元首道歉、建立紀念館等等），但對加

害者的追究極其輕微，例如加害者從未在公開場合陳述事實，更不用說刑事追訴，對於最高應負責任者也就是蔣介石的責任也輕輕帶過，國家象徵中的蔣介石崇拜亦未明確停止。臺灣民眾對轉型正義的淡薄態度，或許還有因為距離二二八事件發生已有六十年餘載，然而在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期，被政府刻意打壓、被迫遺忘，即使解嚴後，民間團體展開重新審視與追憶的運動，二二八事件的轉型正義仍做得非常不夠。薛化元（2011）認為，囿於現實的限制，不僅學校教育，一般社會大眾缺乏對於臺灣過去歷史的認知，也沒有經過歷史清算的歷程，結果立於歷史事實的歷史意識沒有建立，對轉型正義漠視的「放下過去、走向未來」成為社會的主流論述，透過強勢大眾傳播媒體長期的宣傳，成為「文化霸權」籠罩臺灣。

即使臺灣社會正經歷爭取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的過程，戰後世代的部分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的社會、文化性距離越形縮小，彼此基於共同的生活經驗相互理解。上一個世代的「省籍矛盾」看似逐漸消失，但至今不同的階級、族群或黨派，對於二二八事件仍有不同的、甚至對立的記憶和解讀。我們思考：「為什麼要紀念二二八事件？」，紀念是為了防止過去集體暴力再犯，注視過去及現在對人不平等、不正義而造成的傷害，並試圖從歷史教訓反思中，落實人權、滲入日常生活，建立社會歷史共識且「不再遺忘」。紀念館雖然不能解決因為「紀念」所涉及的轉型正義的所有議題，但是有關「認同、罪責及懲罰加害者」的議題，紀念館卻負有提供論辯平臺的任務。身為社會文化機構的當代紀念館，很難如傳統博物館或紀念館一般，能夠說服自己站在「中立」位置描述「客觀」歷史；然而，二二八事件的紀念化歷程，夾在歷史真相、「政治正確」、政治現實的角力下前進，也代表紀念館和歷史、政治、社會以及記憶之間的緊張關係。

博物館的人權教育上，Sandell（2003）認為所有的博物館都有責任，要以自覺和反省的態度來面對其功能的運作，並了解自身擁有的權力，不能自外於社會，應扮演影響社會的機構。博物館不僅培育民眾之公民文化素養，還扮演公共論壇角色，設計對話性展示和教育，引領民眾理解和反思生活中的公共議題，積極參與政策辯論（陳雪雲，2011）。在博物館中，關於人權之展示已不在少數，並且在展示中對人權教育的推行也已逐漸受到重視（Purbrick，2011），博物館注重人權並非是階段性的實踐或是手段。觀眾如果能夠連結近代歷史中所發生的人權侵害，使紀念館成為觀眾聯繫過去和現在的場域，進而瞭解所處的社會環境中的人權問題。然而，從社會轉型需求、文化任務以及公共參與的角度來看，紀念館需要讓觀眾體認到舊時代種種的不正義，鼓勵觀眾面對人權相關議題，而紀念的作用在認識過去和追尋未來之間，建構共識的真相和集體記憶；紀念館必須負擔起作為平臺的主動功能，使過去迥異且彼此矛盾的公共記憶有對話的可能性，進而讓整個社會能夠互相瞭解、和解並共創未來。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選擇臺大與師大兩校大學生，各進行一組焦點團體進行訪談，以訪談所得資訊為基礎設計問卷，再以量化問卷調查大學生非觀眾的背景、不參觀的原因以及對二二八事件的理解，以瞭解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潛在觀眾的特質與需求。

(一) 研究個案

本研究的個案為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於 2011 年正式開館營運，座落於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上，鄰近郵政博物館、國立歷史博物館、植物園。1995 年 12 月行政院成立「財團法人 228 事件紀念基金會」，受理二二八事件賠償申請以及核發賠償金；於 2007 年決定轉型為永續經營的基金會，除了繼續推動原有賠償工作，接手經營與管理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後，更被期許能加強以歷史文物蒐集、典藏展示、轉型正義及人權維護等任務。基金會運用館內空間作為提供舉辦研討會、專題演講及各類營隊活動的場地，培訓二二八志工，並定期辦理志工招募、研習、講座等活動，期望能以此擴充社會教育功能。目前基金會除了規劃舉辦二二八受難者追思紀念儀式，也持續規劃二二八及人權相關主題之展覽與活動、向外蒐集文物、舉辦影展為常見之教育活動，以及提供相關研討會場地及學校營隊贊助與合作。除了常態展外，每年約二至三檔主題展，而教育活動方面則以與主題展配合的講座、影片放映，以及影展為主。

(二) 研究對象選擇

研究對象以就讀鄰近於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之大學的「從未參觀過」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大學生觀眾。由於大學生在大學教育中，除了針對該專業領域的必修課程修習外，相較於國高中時期，選課及排課上有相當的彈性，可以自由分配、安排自己的閒暇時間。也因大學生的身份是獨立於家庭與工作以外，是累積大量文化資本的時期，更能深入發展個人興趣，或是學習對其有意義的相關知識與技能，因此本研究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且基於地緣考量，調查區域以臺北市內的大學為限。考慮進行焦點團體訪談的徵求受訪者來源便利性以及受訪學生背景的多元性，選擇國立臺灣大學（以下簡稱「臺大」）以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師大」）為焦點團體訪談以及問卷發放的群體。臺大為綜合研究型大學，學生學科背景十分多元；而師大雖近年來積極轉型成綜合型大學，仍有接近半數的學生修習教育學程，且相較於臺大，設有教育、美術、音樂、體育等臺大所沒有的科系與學院，因此兩校學生的背景能夠互為補足。

(三) 質性焦點團體訪談研究實施

本研究共進行兩次約 90 分鐘的焦點團體訪談，第一次訪談為臺大焦點團體組，於 2014 年 3 月 21 日；第二次則為師大焦點團體組，於同年 5 月 9 日。

臺大焦點團體訪談盡可能選擇不同學科背景者，並在臺大蔡振家教授所開授之通識課程的課程網上公開徵求自願參與的在學大學生受訪者，考量學科背景與族群，邀請其中 6 人參與焦點團體訪談。但此次公開招募因為女生報名人數少，因此再請臺大農經系畢業同學介紹

2 位女性不同學科背景之大學生，最後共 4 位男性與 4 位女性學生。透過通識課程招募之報名者，皆是修習「疾病與災難的表演與展示」課程的同學，或多或少對於災難與創傷的相關議題有所基本認識或有興趣，但對博物館發展等基本知識並不一定非常熟悉。

師大焦點團體在師大黃玫瑄教授開授之通識課程「博物館探索」中，由研究者親自徵求自願參與的在學大學生，報名有 8 人，最後選擇全部錄取，共 4 位男性與 4 位女性學生參與。選取受訪者之設定是由於該課程是以介紹博物館為主的課程，修習此門課程的同學，或多或少對於博物館有認識或是有興趣，且因為有課堂參訪，同學具有一定的博物館參觀經驗；但相較於臺大的焦點團體受訪者，師大的受訪者對於災難、傷痕的議題不一定有興趣或認識。但也因課堂上招募報名者人數剛好，難以選擇不同學科背景與族群的受訪者，受訪者以文學院、理學院與科技學院為主。以下為兩組焦點團體受訪者基本資料一覽表。

表 2 臺大焦點團體訪談受訪者及師大焦點團體訪談受訪者一覽表

(代號：臺大 T、男性 B、女性 G / 師大 N、男性 B、女性 G)

| 代號 | 縣市別 | 院別系級 | 代號 | 縣市別 | 院別系級 |
|------|-----|----------|------|-----|----------|
| T-B1 | 高雄市 | 電機 / 電機四 | N-B1 | 台中市 | 科技 / 應電一 |
| T-B2 | 台北市 | 文 / 歷史三 | N-B2 | 台中市 | 文 / 地理一 |
| T-B3 | 彰化縣 | 理 / 心理三 | N-B3 | 台北市 | 科技 / 圖傳一 |
| T-B4 | 台北市 | 醫 / 物治一 | N-B4 | 台北市 | 理 / 地科二 |
| T-G1 | 台北市 | 社科 / 政治三 | N-G1 | 高雄市 | 理 / 地科一 |
| T-G2 | 高雄市 | 管理 / 國企一 | N-G2 | 台北市 | 文 / 地理二 |
| T-G3 | 台北市 | 農 / 農經二 | N-G3 | 台北市 | 文 / 歷史四 |
| T-G4 | 澎湖縣 | 社科 / 政治二 | N-G4 | 桃園縣 | 文 / 歷史二 |

(四) 量化問卷研究實施

本研究以從未參觀過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之臺大與師大在學大學生為施測對象，使用自編問卷來蒐集資料，以焦點團體訪談分析結果，以及參考前述文獻回顧所得資訊為設計問卷題項的基礎。在通識課程中發放問卷，並透過網路問卷收集通識課未能接觸的學生填答，以顧及學生學科背景之多元性。在通識課課間，事前徵詢授課老師同意後，向所有學生發放問卷，說明問卷受測對象之限制後，由受測者自由決定是否填寫，下課後僅收回有填答的問卷。網路問卷於臺大及師大大學生能夠接觸到的網路社群（臺大大學生於 PTT 實業坊之專版、具有審核制度的 Facebook 社團）為發放管道，開頭詢問是否為該校在學大學生，並直接設題要求告知是否參觀過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勾選「是，參觀過」者，則直接跳出問卷頁面，以及透過年齡辨認是否為施測對象以篩選受測者身分。

第一次課堂發放問卷於 2014 年 12 月 11 日，透過陳佳利教授介紹，12 月 15 日於臺大蔡振家教授所開授之通識課程「音樂、演化與大腦」發放問卷。第二及第三次問卷發放為 2014 年 12 月 9 日連絡師大臺灣史研究所陳佳宏教授，於 12 月 17 日通識課程「歷史與電影」以及

跟 12 月 19 日通識課程「臺灣歷史與電影」發放問卷。考慮通識課程中可能無法接觸到的學生群，開放網路問卷填答，透過批踢踢實業坊(PTT.cc)中臺大學生聚集的臺大板(NTU_Talk)、師大在校學生僅有各級學生能加入的 Facebook 社團發放問卷連結，施測時間為 2014 年 12 月 15 日至 2015 年 3 月 15 日為止。

因研究時間以及研究規模的限制，本研究在研究期限內共收回 198 份紙本以及 292 份網路問卷。各通識課程以及網路問卷回收問卷與有效、無效問卷數量如下表：

表 2 臺大及師大量化問卷發放狀況及問卷回收情形

| | | 台大 | 師大 | |
|------------------|---------|-----------------------------------|---------------------------------|-------------------------------|
| 通 識 課 程 | 發放時間／地點 | 2014 年 12 月 15 日 台大文學院演講廳 | 2014 年 12 月 17 日 師大公館校區 E102 | 2014 年 12 月 19 日 師大本部誠 101 |
| | 課堂名稱 | 「音樂、演化與大腦」 | 「歷史與電影」 | 「臺灣歷史與電影」 |
| | 有效問卷 | 38 | 71 | 79 |
| | 無效問卷 | 4 | 4 | 2 |
| | 回收問卷數量 | 42 | 156 | |
| 網 路 問 卷 | 發放時間 | 2014 年 12 月 15 日至 2015 年 3 月 15 日 | | |
| | 有效問卷 | 188 | 72 | |
| | 無效問卷 | 30 | 2 | |
| | 回收問卷數量 | 218 | 74 | |
| 總共回收 | | 有效問卷 | 446 | |
| | | 無效問卷 | 44 | |
| | | 回收問卷數量 | 490 | |

因本研究為探索性問卷調查，以敘述性統計分析為主要分析方式。分析針對臺大、師大學生的基本資料、博物館參觀動機、得知博物館與特展的資訊管道，以及受測者對於二二八事件的基本認知與態度、對國內外傷痛相關博物館、二二八事件相關館舍或展覽，與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參觀經驗與參觀意願等題項的分布情況以及相互關係；又家庭與學科背景是否會影響大學生對二二八事件的認知與態度，以及參觀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意願，大學生對於傷痛、人權、二二八事件相關博物館或展覽的參觀經驗，對大學生參觀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意願是否有影響，瞭解其統計結果的特徵。也透過卡方檢定以了解臺大及師大學生的性別差異，對國內外傷痛相關博物館、二二八事件相關館舍或展覽，與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參觀意願上是否有差異。

四、研究發現與建議

(一) 研究發現

1. 大學生大部分為偶發性觀眾，參觀動機主要為個人興趣

本研究施測的大學生中，超過半數為偶發性觀眾，偏好參觀流行文化、人文歷史類及美術類的博物館與展覽。大多數參觀博物館的動機，是因為個人興趣或希望能有輕鬆的休閒活動；得知博物館的管道則大多透過電子媒體，例如網路、電視，尤其是作為博物館與民眾交流平台的博物館官方網頁或粉絲專頁。

2. 大學生認識二二八事件的管道主要為學校教育

大學生部分開始認識二二八事件的管道是學校教育，說明義務教育中的教科書內關於二二八事件的定位、詮釋及說法，對學生一開始理解二二八事件的立場與想法有顯著影響。而大學生家中是否有二二八事件受害者或外省族群的家人，可能會是影響大學生從家庭教育了解二二八事件的關鍵。然而，大部分受測者沒有主動接觸過二二八事件的相關人事物，也認為現有能夠搜尋二二八事件的資訊管道不足，顯示無論是網路資源或學校教育，可能都沒有提供充足的資訊。

3. 同意二二八事件有紀念的必要性，但不清楚二二八事件的紀念意義

關於二二八事件的紀念價值，大學生普遍同意二二八事件有紀念的必要，以及認同二二八事件與臺灣社會的聯結，但對於二二八事件為何被紀念的意義並不明確，甚至有大學生認為不需要有國家級的紀念館，也仍視二二八事件是有爭議的議題，認為討論二二八事件可能會引起族群對立；部分大學生認為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為一國定「假日」，與自己的日常經驗無關，較注重在是否會放假。

4. 重視轉型正義中的賠償作業，對加害者的追究較保留

即使持續記憶是需要建立在追求歷史真相以及對加害者的追究上，大學生對於轉型正義的態度，可能因為對二二八事件以及人權、轉型正義的議題認識不深，較認同臺灣在二二八事件的轉型正義工作上較具成效及能見度的項目——以賠款方式賠償受害者與家屬，但也有可能二二八事件的賠償作業是爭議性較低的項目。對於追究加害者方面，得分較低，顯示態度較為保留，與其認為二二八事件可能會影響社會和諧、造成族群對立有關。另外，在各項

認知與態度的認同程度上，臺大受測者普遍高於師大受測者，符合焦點團體訪談中，臺大受訪者對創傷議題及轉型正義較關注的趨勢。

5. 大部分受測者未來願意參觀傷痛、人權及二二八事件相關館舍或展覽

本研究大部分受測者沒有參觀過國內外創傷、傷痛及人權相關的博物館以及二二八事件相關博物館，但有過半數未來願意參觀，可能是對相關議題有興趣瞭解、關心歷史真相與轉型正義議題，認為要瞭解歷史才能夠瞭解現在、警惕未來。尤其是願意參觀二二八事件相關館舍或展覽的受測者，多數認為臺灣人需要瞭解臺灣歷史，二二八事件對於日漸成長的臺灣認同，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資源。但有些受測者並不太認同紀念館能提供二二八事件在轉型正義上的相關資訊，可能認為紀念館沒有實踐轉型正義，或是不太瞭解何謂轉型正義。然而，部分受訪者對於國內相關紀念館沒有興趣，卻對國外相關紀念館有興趣，顯示有逃避自己民族之歷史的現象。

6. 個人因素與認知為參觀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主要阻因

在所有受測者中，大致呈現有意願參觀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受測者，在紀念性、關聯性與轉型正義等的題目上，都呈現較為認同的趨勢，而沒有意願參觀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受測者，認同程度較低。

不參觀的阻因以個人因素為主，機構因素其次。原因可能是以個人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認知為主，這些認知又會形成受測者對於館舍的負面想像，認為博物館的氣氛或展示可能無法符合觀眾自身的期待，造成大學生受測者對紀念館有疏離感；除了覺得主題沉重，而且二二八事件也並非是他們比較關心的議題。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除了以往教科書對二二八事件的的詮釋及說法影響大學生的認知，透過焦點團體訪談得知，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當天的媒體報導內容，以及政府流於形式的「紀念」，使得紀念價值沒有被彰顯，也是令大學生不了解事件的紀念意義，也無意參觀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原因之一。而有部分大學生視二二八事件是有爭議的議題，認為討論二二八事件可能會引起族群對立或具有特定意識形態，進而認為相關議題的展覽沒有呈現真相，也影響了大學生是否參觀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意願。

7. 性別無顯著差異，但家庭背景可能影響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參觀意願

透過卡方檢定得知，性別的差異不影響參觀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意願。而雖然家族中有二二八事件受害者的受測者並不多，但家族中有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對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有較高的參觀意願，而家中有外省族群者參觀意願較低。顯示「省籍矛盾」看似逐漸消失，但

上一世代為不同族群或不同背景，可能對二二八事件仍有不同的記憶和解讀，還是會間接影響下一代對二二八事件的看法。

8. 學科背景不同對於參觀意願及二二八事件的認知有所差異

在學科背景的分析上，發現人文社會學科背景的大學生較願意參觀內外傷痛相關博物館、二二八事件相關館舍或展覽以及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可能與其學習內容有密切關係，而對二二八事件紀念價值與認知以及轉型正義也抱有較高的認同態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人文社會學科的專業背景，可能讓他們認為紀念館的展覽內容並未突破其所學的內容，也會影響參觀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意願。而理工學科及生農生科醫衛背景的受測者，可能也是因其學科背景的關係，對二二八事件等議題較沒有興趣，也因為周遭生活圈缺乏討論，認為相關議題和自己的生活沒有關係。另外，也有不少的受測者認為現今的二二八事件已淪為政治操弄的工具，並以理工學科及生農生科醫衛背景的受測者為多。

9. 過去參觀經驗會影響參觀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意願

整體而言，平時為博物館非觀眾的受測者，對博物館的參觀意願較低；而過去有傷痛相關博物館的參觀經驗，很大部分也願意參觀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有國內外傷痛相關議題參觀經驗者，可能由於過去的參觀經驗較佳，有較高的意願參觀國內二二八相關紀念館及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但曾經參觀國內外二二八相關館舍或展覽的受測者，卻反而可能覺得比較不需要再參觀相關的館舍。

(二) 研究建議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作為二二八事件的展示、收藏、研究機構，館旨在於「使國民瞭解事件真相，撫平歷史傷痛，促進族群融合；協助國人瞭解事件真相之文宣活動、辦理二二八事件之調查及考證、平反受難者名譽及促進臺灣社會和平等工作。」(二二八國家紀念館，2012) 被期許能加強歷史文物蒐集、典藏展示、教育推廣、轉型正義及人權維護等任務。以下將根據上述宗旨、紀念館目前所知的展示以及教育活動、文獻回顧與研究發現，提出以下建議。

1. 厚實研究並轉換為與社會大眾的溝通媒介與素材

從研究發現得知，個人認知會影響大學生參觀的意願，而教科書、媒體、政治人物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解讀與態度，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大學生對二二八事件的認知。紀念館必須清晰認知其宗旨和任務，形成更有效的博物館政策，進行社會溝通。面對大學生因學校教育中教科書的內容、家庭教育、新聞媒體、以及政治人物的言行，因此不瞭解二二八事件為何被紀

念、視二二八事件是有爭議的議題、認為討論二二八事件可能會引起族群對立，都顯示相關研究並未得到社會重視的結果。建議紀念館除了持續執行口述歷史的研究，增加展示與討論二二八事件的深度，並將相關研究與展示成果轉換成為紀錄片或教案等媒介，並可以於每年二二八和平紀念日時，主動將最新的研究內容配合特展提供大眾新聞媒體與社群網站傳播，讓民眾瞭解其紀念性以及議題重要性。紀念館也必須關注教育機關所訂立之課綱內容中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詮釋與描述，是否能夠呈現其作為當代臺灣歷史重要課題、且與臺灣的過去與未來有著密切關係的意義，並結合學術專業社群對教育機關提出相關建議與協助。

2. 加強轉型正義課題之介紹與反思

我們得知大學生對於轉型正義的原則中，較為認同賠償作業而對加害者的追究較保留。思考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館旨，強調「協助國人瞭解事件真相之文宣活動、辦理二二八事件之調查及考證、平反受難者名譽及促進臺灣社會和平等工作」，而落實轉型正義有究明真相、釐清責任歸屬、道歉補償、確立防止再度發生四項必要工作；紀念館僅在「賠償」方面，平反受難者名譽及賠償方面進行多年有顯著的成果，但未能積極追求轉型正義的其他重要課題、回應當代社會認識人權價值的需求，使一般社會大眾缺乏對過去歷史的認知，更對轉型正義的議題不大了解，在真相始終未能明瞭之下，社會內在的矛盾更懸而未決。

紀念館雖然無法解決因為「紀念」所涉及到轉型正義的所有議題，但有關歷史真相與認同、追究加害者與釐清責任歸屬等，為促進臺灣社會和平與和解之前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紀念館有義務主動提出相關議題的思考，並提供公民公開論辨的平台；而全體館員都更應該認同二二八事件做為當代臺灣歷史的重要課題、與臺灣的過去與未來有著密切關係。換句話說，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夾在歷史、政治、社會以及記憶之間前進，面對對此議題有著多樣聲音的社會，應採納多元的研究成果與史觀，並表明不同研究者的觀點及立場，而尚未有定論的歷史課題，也可以呈現說明，開放並邀請觀眾與之對話。

3. 以更多元形式及觀點呈現二二八事件

目前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除了常設展內容以「大歷史」為主軸，也已逐漸關心以往在展示中未現身的「加害者」身影，特展也可以注意「小人物」（在官方脈絡中未現身的）的故事。大學生他們也期待能有「容納多元觀點的內容」、「展示不同的族群經驗與遭遇」及「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故事」的展示內容與手法，並期望在紀念館中能看見實體物件或是復原場景的展示，且不願意閱讀過多的展版文字描述。

面對有大學生仍視二二八事件是有爭議、受到政治人物操弄的議題，認為討論二二八事件可能會引起族群對立。二二八事件具有人權、國家暴力、殖民等多面向，展示內容無法避

免地必須面對傷痛，但若能夠透展示內容關注當時身處臺灣的不同族群在二二八事件中的遭遇或立場，在歷史事實的基礎下，加強事件敘述的豐富與多元性，以期讓不同背景與族群的觀眾都能夠感同身受、神入（**empathy**）歷史，從他者經驗中引發共鳴，從自己國家的歷史中，理解在國家暴力以及危害人權的威權面前是不分族群的，進而關注轉型正義等相關議題。

4. 加強宣傳與增加教育推廣活動

本研究大多數受測者得知博物館的管道則大多透過電子媒體，例如網路、電視，尤其是作為博物館官方網頁或粉絲專頁，但獲得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資訊的方式大多數為親友告知。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目前有官方網站以及 **Facebook** 粉絲專頁作為傳播展覽、活動訊息的管道，但之中的交流、分享熱度並不廣泛。建議可以更朝著現今大學生接觸訊息的管道，例如社群媒體（**FB**、**Youtube**）及電子媒體（電子報、網站等），增加發佈訊息的頻率或舉辦活動，將社群軟體定位成與民眾交流的平台，接受民眾的提問及提供資訊，並與當代社會議題結合。

另外，與學校合作推廣，也可能較能將資訊傳播至大學生的生活圈之中。大學生受測者認為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可以舉辦的活動內容，導覽解說、講座及影片欣賞為最多人填寫。目前該館配合團體進行的導覽解說須提前預約，相關的講座及影片欣賞則大多是配合「二二八人權影展」及主題展舉行，如能成為常態性活動，並常有導覽人員駐館協助觀眾參觀，且透過宣傳讓大學生了解該館豐沛的資源與活動能量，將可以促進參觀動機；另外，規畫二二八史蹟路線參觀護照也是能夠結合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內容，透過各點串聯，讓觀眾以實地體驗與休閒活動的方式來瞭解二二八事件。

5. 透過館校方合作加強與學校的連結

從研究發現中得知，學生的知識背景廣泛影響學生是否願意參觀的意願，而非人文社會學科背景的大學生，參觀意願明顯較為低。該館與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曾規劃人權議題相關課程的合作，達到部分程度的宣傳效果，透過讓紀念館成為大學校園的延伸的概念發想，或許能與大學有更廣泛的合作。例如，紀念館可試圖與學校相關通識課程結合，透過校內通識課程內容的安排或與博物館接洽合作（館方人員至校內上課，或是安排學生至館內參訪、授課等等方式），提供教案或是教具、舉辦教師研習營、講座與影片欣賞對談會等等，使校方瞭解紀念館作為學習場域的可能性，並思考要如何與其專業背景對話及互動，引發大學生對於相關議題的興趣，讓學生開始願意接觸相關議題。

6. 針對有著不同參觀經驗的大學生提供多樣化學習連結

從部分大學生觀眾的態度可以發現，過去參觀經驗的既定印象，以及有國內外傷痛相關議題參觀經驗，會影響大學生對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參觀意願。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成立至今，已有舉辦多種類型的主題展與小型展，包含各類影像照片展、紀念人物特展，以及介紹國外人權或傷痛議題相關紀念館的展覽(參考附錄一)。從議題的學習與連結思考紀念館的能動性，紀念館除了繼續籌畫以二二八事件週邊相關議題為主軸的展示，也可以持續與國內外相關人權或傷痛議題的紀念館與博物館合作，與關心各種不同議題的社群團體串聯，規畫國內外相關館舍深度合作策展，以及和不同團體社群積極主動交流，破除觀眾對相關議題展示的刻板印象，進而產生多重對話。紀念館應透過對不同議題的思考與關注，串聯起民眾對整體社會人權與傷痛議題的關懷，進而引發參觀的意願，甚至對二二八事件產生興趣。

7. 嘗試與當代社會議題及相關議題結合並持續進行觀眾研究

對紀念館而言，除了館的設立宗旨、必要的功能性專業基礎之外，還因以自身定位為基礎，面對外在社會的各樣課題。紀念館傳遞受難歷史給當代觀眾，除了必須多角度詮釋檔案史料、受難者的記憶，也應納入當代思潮和議題的討論，呈現活生生的「歷史教訓」，以連結當代觀眾日常生活的話題，讓二二八事件不僅是「非日常」的教訓，與現今社會持續保持互動關係。作為社會文化機構的當代紀念館，除了辯明歷史，促使每個人面對公民的「人權」責任，應意識到與當代多元觀眾溝通的重要性，必須勇於跨越圍牆，在經歷轉型正義的社會中，歡迎多樣的團體加入協商、促進對話，與相同類型的紀念館或博物館發展夥伴關係，為觀眾帶入人權教育情境，以產生多重的意義。並且必須持續針對觀眾發展研究計畫，不僅是現場的觀眾參觀滿意度問卷，策劃展覽前後都可以納入觀眾意見以瞭解他們參觀的期望與建議，並鼓勵各方團體參與，讓民眾瞭解各方立場、彼此對話且建立參與感，使一般民眾認知到二二八事件不僅是受害者的二二八事件，甚至是全臺灣都應重視的重要課題。

五、研究限制與反思

本研究以量化問卷為主、焦點團體訪問為輔，囿於研究時間、研究地點與研究資源的限制，以臺大及師大的大學生為焦點團體訪談以及問卷發放的群體，因此本研究對象即「從未參觀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臺大及師大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是以調查結果無法完全類推於其他地區大學生。也因發放問卷的通識課程內容、二二八事件的性質，以及網路問卷的發放效果，部分的學院與學科填寫問卷的比例較低，樣本數不足，所得結果代表性較低。未來相關研究主題若希望獲得廣泛性的資料，也可與學校的多門通識課程合作，以獲得不同學科背景的學生填答的資訊。若要更深入瞭解學生不願意參觀相關紀念館的原因以及個人經驗，可與學校合作進行訪談研究，紀錄學校團體參觀前與參觀後，對二二八事件的理解與認知有何不同、參觀心得及建議等等，以獲得更深入的分析資料。

近年來，每年的二二八和平紀念日彷彿像是一日「風潮」，當紀念儀式、輿論、新聞媒體歡騰一陣轉往下一個話題後，只剩下小部分的群眾仍呼喊著「不可忘記」、繼續默默推動著轉型正義的持續進行；二二八事件仍逐漸面臨著「遺忘」的危險。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作為二二八事件的展示、收藏、研究機構，也肩負文化與歷史教育的功能，將這個歷史事件與記憶傳承下去，並使參觀者反思，將展覽與當前的文化與政治課題連結，並進而思考人權的價值，是紀念館所面臨重要任務。然而，即使觀眾踏入了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參觀紀念館後是否真的能夠「永不忘記」、紀念館要如何推動並實踐「不再發生」的願景？紀念館背負追求這段「人權侵害」及「國家暴力」的歷史真相及轉型正義的工作，但如果我們無法讓觀眾在紀念館裡學習辨識傷痛與人權議題的真相與記憶，理解加害者、受害者、旁觀者共處在一個的時代裡的角色，以及他們所面對的道德、人性的掙扎，無法讓民眾從歷史教訓反思中，落實對人權的追求並融入日常生活之中，我們將如何建立社會歷史共識、又如何「永不忘記」、更有可能「不再發生」嗎？

在教育之外、社會之內，青年世代如何面對現今的二二八議題？自 2013 年開始，二二八「共生音樂節」從一群關心臺灣歷史及社會議題的大學生社群中誕生了；他們認為對於新時代的青年來說，臺灣歷史雖然不再是無法接觸的禁忌，因為考試與升學主義的影響，缺乏完整的理解與深刻的追尋，台灣歷史的多元性、複雜性不易被理解，一個經過辯證、思索與選擇的認同無法形成。然而，博物館無法自外於社會及教育，若要突破現實的限制，須以一個能動者的角色主動與學校或社會運動結合，使議題被關心；博物館與紀念館不應該只是發佈政府的聲音，應有自我意識，要瞭解自己這個館為何而成立、為了什麼價值而存在。

如同歷史學家卡爾（E. H. Carr, 1892-1982）於其名著《What is history?》（2001）所言：「歷史是歷史學家與他的事實之間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是現在和過去之間永無止境的對話。」，研究歷史事件無法獨立於時代之外，以歷史事件為展示主軸的紀念館亦然，紀念館常常夾在過去與現在的爭辯之中。然而，大學生正值追求自主學習、吸納多方面文化資本並培養獨立思考及價值觀判斷的階段，紀念館在其學習以過去經驗建構未來的過程中，應持續與社會以

及民眾互動與對話，思考要如何透過紀念館展示的各種機制與內涵、舉辦各種相關的教育活動，提供大學生瞭解歷史與當代之間的互動關係、培養歷史意識，並學習人權價值的場域，才能夠不斷的發掘紀念館在當代社會中的定位以及新的意義。

參考文獻

(一) 中文

- Barrett, J., 邱家宜譯, 2012。追求民主——作為公共空間的博物館 (Attempting Democracy: The Museum as Public Space), 博物館學季刊, 26(4): 7-28。
- Bogdan, R. C. & Knopp, B., 李奉儒等譯, 2001。質性教育研究：理論與方法。嘉義：石濤。
- Davies, A., 李惠文譯, 1999。博物館行銷與非觀眾, 博物館學季刊, 13(2): 63-74。
- E.H. Carr., 江政寬譯, 2009。何謂歷史?。臺北：博雅書屋。
- Falk, H. J. & Dierkin, L. D.原著；林潔盈、羅欣怡、皮准音、金靜玉等譯, 2002。博物館經驗，臺北：五觀藝術。
- Hurlock, E. B., 胡海國編譯, 1992。青少年心理學。臺北：桂冠圖書。
- Jensen, N., 劉幸真譯, 1991。博物館的兒童、青少年與成人觀眾, 博物館學季刊, 5(4): 3-8。
- Kelly, L., 2010。觀眾與學習者：博物館成人觀眾的學習認同 (Visitors and Learning ; Adult museum visitors' learning identities), 科技博物, 14(3): 5-20。
- Lane, J., 2006. Reaching Teenage Audiences Case Studies. 收錄於李明珠主編,《博物館與青少年—2006年博物館館長論壇》，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頁：178-205。
- Lerner, M. R., 黃德祥等譯, 2008。青少年心理學：青少年的發展、多樣性、脈絡與應用，臺北：心理出版社。
- Sandell, R., 陳佳利、城青汝譯, 2003。博物館與社會不平等的爭鬥：角色、責任、抗拒，博物館學季刊, 17(3): 7-23。
- Stewart, D.W. & Shamdasani, N., 歐素汝譯, 2000。焦點團體：理論與實務。臺北：弘智。
- 王文科、王智弘, 1999。焦點團體訪談：教育與心理學適用。臺北：五南。
- 王啟祥, 2002。從休閒觀點析論博物館觀眾開發的困境與對策, 博物館學季刊, 16(4): 121-131。
- 王啟祥, 2004。國內博物館觀眾研究知多少, 博物館學季刊, 18(2): 95-104。
- 王啟祥, 2008。博物館觀眾學習成果與影響研究的發展與啟示。博物館學季刊, 22(4), 91-107。
- 王啟祥, 2011。博物館觀眾身分認同的研究與啟示, 收錄於《認同建構—國家博物館與認同政治論文集》，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頁 2-12。
- 王煥琛、柯華崑, 1999。青少年心理學。臺北：心理出版社。
- 石忠山, 2014。轉型社會的民主、人權與法治—關於「轉型正義」的若干反思,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10(2): 1-30。
- 呂憶皖, 1998。博物館非觀眾的開發, 科技博物, 2(3): 109-120。
- 江宜樺, 2007。台灣的轉型正義及其省思, 思想, 5: 65-81。
- 吳乃德, 2006。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 思想, 2: 1-34。
- 吳乃德, 2008。書寫「民族創傷」：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記憶, 思想, 8: 39-70。
- 吳忠宏、江宜珍, 2003。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觀眾參觀動機與滿意度之研究, 科技博物, 7(1): 35-59。

- 吳春秀，1996。博物館觀眾研究——以故宮博物院玉器陳列室為例，博物館學季刊，10(4)：23-30。
- 吳建華、謝發昱、黃俊峰、陳銘凱，2004。個案研究。載於潘慧玲主編，教育研究的曲徑：概念與應用。臺北：高等教育。頁 199-236。
- 李盈盈，1998。從觀眾的需求來探討博物館的服務導向，國立歷史博物館學報，11：195-205。
- 李惠加，1999。青少年發展。臺北：心理出版社。
- 別蓮蒂，2006。青少年的博物館參觀行為與長期博物館良性關係建立，收錄於李明珠主編，《博物館與青少年—2006 年博物館館長論壇》，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頁 206-213。
- 邱子育，2008。博物館社區非觀眾的經驗與想像—基隆市「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個案研究，天主教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邱皓政，2011。量化研究法（二），臺北：雙葉。
- 林仲如，2010。了解博物館非主要觀眾族群—博物館與其日常生活結合之必要性，收錄於《博物館 2010：二十一世紀的博物館價值與使命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 林詠能，2009。誰的博物館經驗？談博物館觀眾研究，博物館的創意經濟—台英博物館實務研習營大會手冊。
- 若林正丈著，薛化元審訂，2014。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周婉窈，2012。關於「轉型正義」的補充說明及其他。瀏覽日期：2014 年 7 月 1 日，檢自：<https://tmantu.wordpress.com/2012/12/14/%E9%97%9C%E6%96%BC%E3%80%8C%E8%BD%89%E5%9E%8B%E6%AD%A3%E7%BE%A9%E3%80%8D%E7%9A%84%E8%A3%9C%E5%85%85%E8%AA%AA%E6%98%8E%E5%8F%8A%E5%85%B6%E4%BB%96/>)
- 周樑楷，2006。歷史意識是種思維的方法，思想，2：125-162。
- 洪莘瑄，2011。台灣文學館非觀眾之研究，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碩士論文。
- 胡昌智，1988。歷史意識與社會變遷，臺北：聯經。
- 胡幼慧主編，1996。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臺北：巨流。
- 施正鋒，2007。轉型正義的探討——由分配到認同，臺灣史學雜誌，3：3-31。
- 徐宗國譯，1997。質性研究概論。臺北：巨流。
- 許功明、劉幸真，1998。博物館參觀經驗之比較：以省美館與科博館為例，博物館學季刊，12(3)：3-34。
- 許功明，2002。「近廟忌神」—社區居民參與科博館之研究，博物館學季刊，16(1)：91-103。
- 施國政，2009。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 陳丹怡，2009。歷史創傷經驗與解說—以嘉義市陳澄波、二二八文化館為例，師大社教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 陳佳利，2003。博物館、多元文化與社會參與平等——以英國的經驗為例，博物館學季刊，17(1)：

139-147。

- 陳佳利，2007。被展示的傷口：記憶與創傷的博物館筆記，臺北：典藏藝術家庭。
- 陳香君著，周靈芝、項幼榕譯，2014。紀念之外：二二八事件·創傷與性別差異的美學。臺北：典藏藝術家庭。
- 陳雪雲，2005。臺灣博物館觀眾研究回顧與展望：從現代到後現代主體，收錄於王嵩山主編，博物館、知識建構與現代性，頁 115-140。
- 陳雪雲，2010。博物館是世界公民終身學習的場域，博物館學季刊，24(4)：5-17。
- 陳雪雲、吳慎慎、陳仲彥、郭文耀，2013。重返歷史、人權與記憶——臺灣烏腳病醫療紀念館的新未來，博物館學季刊，27(2)：31-53。
- 陳翠蓮，2008。歷史正義的困境——族群議題與二二八論述，國史館學術集刊，16：179-222。
- 黃永川、辛治寧，2006。年輕觀眾－博物館有待開拓的一個市場，收錄於李明珠主編，《博物館與青少年－2006 年博物館館長論壇》，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頁 68-104。
- 黃俊傑，1996。歷史思維的特質，通識教育季刊，3(1)：31-40。
- 黃俊傑，1986。歷史教育與歷史意識的培育，收錄於黃俊傑，儒學傳統與文化創新，臺北：三民，頁 159-170。
- 葉重新，2001。教育研究法。臺北：心理出版社。
- 蔡怡君，2004。從崎嶇教改路反思我國教師之博物館經驗：臺灣與英國個案之比較研究，博物館學季刊，18(1)：29-40。
- 殷寶寧，2012。大學生博物館經驗初探：以觀眾認同與服務品質為核心，文資學報，7：47-81。
- 楊愉珍，2012。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常設展應用口述歷史之研究，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所碩士論文。
- 楊孟倫，2013。大學生參觀成大博物館之經驗與認同之研究，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所碩士論文。
- 簡孜宸，2010。如膠似漆還是保持距離？博物館觀眾的陪伴行為與社交動機，收錄於《博物館 2010：二十一世紀的博物館價值與使命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 鄭時宜、黃慶源、蔡秀芳、李宗侯，2003。南臺灣博物館參觀觀眾生活型態初探，科技博物，7(1)：60-75。
- 張譽騰，2000。當代博物館探索，臺北：南天書局。
- 曹欽榮，1999。歷史紀念館的展示敘述：身體、紀念與歷史關聯的初步探討，民俗曲藝，161：185-263。
- 曹欽榮，2008。歷史、政治、展示：我看 228 紀念館，空間雜誌，114：81-96。
- 曹欽榮，2011。紀念博物館、記憶研究與轉型正義－從國際經驗到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所碩士論文。
- 曹欽榮，2012。紀念博物館在轉型正義中的角色，國立臺灣博物館學刊，65(1)：45-65。
- 劉婉珍，1994。瞭解美術館成人學習者，博物館學季刊，8(2)：47-53。
- 劉婉珍，1994。博物館成人教育的特性與實踐——以美國多勒多美術館與錄音導覽為例，博物

館學季刊，8(4)：57-65。

劉婉珍，2008。觀眾研究與博物館的營運發展，博物館學季刊，22(3)：21-37。

(二) 外文

Anderson, D., 1997. *A Common Wealth: Museum and Learn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report to the Department of National Heritage*. London: Department of National Heritage.

Chen, C-L., 2003. Interpreting History: Adults' Learning in the Taipei 228 Memorial. *Museum Museological Review*, 9: 16-29.

Erikson, E.H., 1963. *Childhood and Society*. (2nd ed.). New York: Norton.

Falk, J. H. & Dierking, L. D., 1992. *The Museum Experience*. Washington D.C. :Whalesback Books.

Falk, J. H. & Dierking, L. D., 2000. *Learning from Museums: Visitor Experiences and the Making of Meaning*.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Falk, H. J., 2008. Viewing Art Museum Through the Lens of Identity. *Visual Arts Research*, 34(2):25-34.

Hein, G. E., 1998. *Learning in museum*. London: Routledge.

Hood, M. G., 1993. After 70 years of audience research, what have we learned? Who comes to museums, who does not, and why? [Electronic version]. *Visitor Studies: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Vol. 5(1), pp.16-27.

Hooper-Greenhill, E.,1999. Education,commun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owards a critical pedagogy in museums. In E. Hooper-Greenhil (Ed.), *The educational role of the museum*, 2nd ed., pp.3-27. London:Routledge.

Holmes, S., 1995. Democracies Reckon with Former Regimes. In Neil J. Kritz(Ed.), "The End of Decommunization," in *Transitional Justice: How Emerging Democracies Reckon with Former Regimes*, vol. 1, pp.118-19.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Lam. S. H. A.,2004. A Small-Scale Opinion Survey of Non-Museum Visitors at Two University Museums in Hong Kong. *Visitor Studies Today*, Vol.VII(1):23-32.

Lemerise, T., 1995. The role and place of adolescents in museums: yesterday and today.*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14(4): 393-408.

Mario D-P., 2010. Beyond the rhetoric of 'never forget': considering what a museum of forgetting could be a museum of(http://www.philosophy-of-education.org/uploads/papers2010/Di_Paolantonio.pdf)

- Mason, D. D. M. & McCarthy, C., 2006. The feeling of exclusion: young peoples' perceptions of art galleries.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1(1): 20-31.
- Purbrick L., 2011. Museums and the embodiment of human rights. *Museum and society*.
(<http://www2.le.ac.uk/departments/museumstudies/museumssociety/documents/volumes/purbrick.pdf>)
- Sandell, R., 1999. New directions, new audience: A case study of Nottingham museums. In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Eds.), *New directions for new century: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museum marketing*, pp.181-195. Taipei: Th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 Schäfer, H., 1996. Non-Visitors Research: An Important Addition to the Unknown.
(http://archive.informalscience.org/researches/VSA-a0a2o4-a_5730.pdf)
- The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2011. Discover the past for the future—The role of historical sites and museums in Holocaust education and human rights education in the EU.
(http://fra.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fra_uploads/1792-FRA-2011-Holocaust-Education-Summary-report_EN.pdf)
- Williams, P., 2007. *Memorial Museums: The Global Rush to Commemorate Atrocities*. Oxford, UK: Berg.
- Williams, P., 2010. Hailing cosmopolitan conscience: Memorial museums in a global age. In: Cameron, F. and Kelly, L.(Eds.), 2010, *Hot Topics, Public Culture, Museums*, pp. 227-243.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 Xanthoudaki, M., 1998. Educational provision for young people as independent visitors to art museums and galleries: Issues of learning and training.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17(2):159-172.